

农村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

(第四集)

郭书田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前 言

本集收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郭书田教授在2000年7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撰写的文章，多数是当前农村的热点问题，供作农业管理干部培训班的参考教材。

编者

目 录

一、21 世纪的中国农业与农村	(1)
二、英德市实行以城市为导向带动农村战略的启示	(23)
三、中国生态农业的希望	(27)
四、把常熟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市	(31)
五、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	(34)
六、推进中俄农业合作, 使我国农业走向国际	(37)
七、广州市农业的新发展	(39)
八、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农业谈判的若干问题	(43)
九、四则来自农村的报道说明了什么	(46)
十、修改《农业法》的若干问题	(49)
十一、农村社会学应更好地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服务	(53)
十二、农垦企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54)
十三、发展绿色产业的几个问题	(61)
十四、把黄河三角洲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绿洲	(70)
十五、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及农业外交的战略思考 ...	(74)
十六、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	(80)
十七、制定《农村合作社法》问题	(83)
十八、再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85)
十九、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组织保护农民利益	(89)

二十、乡镇企业与 WTO	(91)
二十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94)
二十二、祝愿平衡施肥试验在新形势下更上一层楼	(97)
二十三、现阶段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若干问题	(99)
二十四、发展奶业是一项重大战略	(103)
二十五、采取治本之策，建立治沙与治贫相结合的机制	(105)
二十六、热烈祝烈《中向农业实践概论》的出版	(107)
二十七、千方百计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109)
二十八、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110)
二十九、赢得农民	(116)
三十、发展都市农业的重大意义与对策	(119)
三十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123)
三十二、21 世纪的中国生态农业	(127)
三十三、中国“入世”：农业与肥料的对	(132)
三十四、土地股份合作是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	(136)
三十五、开发西部教育事业的新举措	(139)
三十六、农村经济与农税改革	(145)
三十七、《黄河边的中国》的启示	(147)

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刚才协和医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陆莉娜老师说到缘份。讲缘份，还有两点：一点是，半个世纪以前，我进北京城，刚解放，突然生病，第一次到北京看病就是协和医院，现在到协和看病，还可以找到我那时的病历，因为协和保存病历很完整。大家知道，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病历在协和都可以找到。第二是，陆莉娜老师是社会学系的主任，我不是学社会学的，但我和社会学也还有点缘份，因为我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我现在还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的理事长，这也是一点缘份，在学术上的一点缘份。前不久认识了陆莉娜老师，她很热心地安排今天这个讲座。我很高兴地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把我所了解的中国农业与农村的问题作个介绍，供大家研究参考。

在讲 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之前，先讲一点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的现状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有十二亿五千万人口，农村人口有九亿，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除中国外，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这么四句话：没有农村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社会稳定；没有农村的社会进步，也就没有全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这四句话很符合中国的实际。农业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全局性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农民的问题、中国农业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几个阶段，农业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当中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个序幕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的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 20 年改革与发展，概括地说：中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基本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综合生产能力用粮食来讲，大体达到 5 亿吨左右，也就是 1 万亿斤左右，1998 年为 4.9 亿吨以上，也就是 9800 亿斤以上。光看总产量还不够，还要看人均的占有量。人均的占有量大体达到 400 公斤左右的水平。现在农业的生产力大体就是这个水平。人均 400 公斤是个什么概念呢？同国外比较一下，德国人均 400 公斤，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它的机械化很发达，欧盟以它为首，它仅次于美国。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莱斯特·布朗，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做“21 世纪谁能养得起中国”，后来引起全世界强烈的反响，由此导致出一个“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开始是从粮食说起的，其

根据来源于这位学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到 21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将到 16 亿，中国的土地不断地减少，水资源极度地短缺，科学技术也比较落后，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比现在下降 20%，以致粮食缺口将达到 3.7 亿吨，全世界的贸易粮只有 2 亿吨。全世界能够出口的粮食都给中国还不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谁能养得起中国？”按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谁也养不起中国。

经过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到 2030 年，我国人口最高峰为 16 亿，是国内人口学家比较认可的一个数字，2030 年以后人口开始下降。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西方人不完全一样，按东方人的膳食结构计算，到 2030 年大体上仍维持人均 400 公斤的消费量这个水平。人均 400 公斤，16 亿人口，总需求量为 6.4 亿吨。现在是 5 亿吨左右，缺 1.4 亿吨。在现在基础上，增加 1.4 亿吨，主要靠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 6.4 亿吨总产量目标。这是农业科学界比较一致认可的一个预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用 16 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每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达到 400 公斤，就可以实现。一个是播种面积，一个是每亩的产量。两个 16 亿，两个 400，需求量为 16 亿人口乘人均 400 公斤；供给量为 16 亿亩的播种面积乘每亩 400 公斤的产量，就可以实现。现在看来问题不大。16 亿亩的播种面积，低于近两年实际的播种面积，近两年的实际播种面积是 17 亿亩。多出来一亿亩。农业部有一个安全线，即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不能低于 16.5 亿亩。如果低于 16.5 亿亩，可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出现粮食供给的紧张。这两年 17 亿亩，大家的感觉是粮食多了，农民卖不出去，市场粮价很低，粮食部门也不愿意收购，国家粮库堆放的粮食很多，财政负担也很重等。这一系列的矛盾是粮食多余的矛盾，而不是短缺的矛盾。所以说播种面积问题不是很大，当然还要严格控制耕地减少。

最近国家土地局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每年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做到了总量的动态平衡，这很不容易。过去若干年，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耕地大量减少，通过复垦和新开垦的土地来补偿减少的耕地，还不能平衡，而是“赤字”，每年净减少三百万亩左右，而且都是好地。1998 年第一次实现了总量动态平衡，解决了耕地减少的“赤字”问题，净增加了一百万亩，占的地，加上补偿的地之后，多余出来一百万亩，这是首次。既然有了首次，以后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总量动态平衡，而且还能平衡有余，这样就可以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 16.5 亿亩，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最近新加坡的李光耀在上海参加《财富》五百强论坛，提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耕地减少，他很关注这个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就要占地。修高速公路，修铁路，修机场，就必然占地。占地还要靠新开垦和复垦的土地去补偿。实行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占地收入的耕地占用税，专门拿来复垦和新开垦耕地，补偿被占的耕地，真正实现总量动态平衡。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 16 亿亩的播种面积上实现亩产 400 公斤的产量。现在亩产量多少呢？大体上是 300 公斤左右，1997 年为 292 公斤，还要提高 100 公斤左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靠科学技术。首先要靠良种，还要靠耕作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灌溉技术等等，综合配套。这里还要说一个信息，现在计算耕地面积是统计面积，是 14.3 亿亩，我刚才讲粮食播种面积 17 亿亩是加了复种指数，包括一年两季，三季，目前的复种指数 156%，整个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是 23 亿亩。

这是统计面积。实际的耕地面积是多少呢？近 20 亿亩，相差百分之四十二。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美国的卫星照片；第二个是中国科学院的遥感测量；

第三个主要是国家土地部门十几年的实地勘测。这三个来源数字，大体接近 20 亿亩。这个数字中央准备适当的时候公布（注：新华社 1999 年 11 月 3 日公布，全国耕地面积为 19.5 亿亩）。公布以后会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计算的亩产量没那么多了，因为亩产量是按 14.3 亿亩计算的，如果接近 20 亿亩的计算，亩产量就下跌了，反过来讲，亩产量没有那么多，现有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非常大。

以上是拿粮食做代表，分析现在中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体就这样一个概念，5 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到 2030 年，实现 16 亿亩播种面积，亩产量 400 公斤，总产量 6.4 亿吨；16 亿人口，人均 400 公斤的目标是可能的，当然要经过努力。

第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或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是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这两句话，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又是个很重要的标志。有的学者讲结束了短缺经济的时代，过去实行的长达 30 年之久的计划经济，而这个计划经济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供给短缺，不得不采取配给制的办法，也叫做“票证经济”。1999 年国庆 50 周年的时候，回顾历史，很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过来人，发票的历史都亲身经历过。粮票面值小到什么程度？半两。拿着半两粮票去买一点饼干，买一点面包。最近发现上海还有半两的二分之一的粮票，就是二钱五。记者采访收藏者，当作很珍贵的东西珍藏，全国没有，全世界也没有。现在要买这张二钱五的粮票恐怕要很高的价钱。记者问他，你这个二钱五的粮票用过没有？还是当作珍藏品珍藏起来？他说，不，我用过。二钱五粮票能买什么？买一块饼干。

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短缺经济的历史，为了满足人民的最低需求，设计得很细，也很有意思。这个时代可以说结束了，今后还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我们常议论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不会吧。但也不能把话说绝对了，万一出现连续几年的灾荒，会不会重新又实行配给制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才有这个判断，短缺经济的时代过去了。

短缺经济这个词是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专门写的一本书《短缺经济学》，上下两册，就讲短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于短缺经济，或者准确一点讲，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等于短缺经济。在中国，连续 30 年之久，现在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我们结束统购派购历史是 1985 年，不是 1979 年。也就是 35 年这样的历史。

还有一些学者说中国已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也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出现了买方市场。现在市场上农产品琳琅满目，东西确实很丰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价钱很低。昨天是星期天，我到自由市场看了看，东西实在便宜，猕猴桃十元钱六斤。猕猴桃是维生素王，新西兰的猕猴桃是从中国引进“中华猕猴桃”以后改良的，行销全球。现在大商场摆的猕猴桃贴的标签是新西兰，仔细一看，实际上也不是新西兰的，是国内生产的，陕西、河南等地大面积种植猕猴桃。口味很好，色泽也很好，就是外观粗糙一点，形状大小不大一致。打着新西兰标签，在市场上销售的猕猴桃，是 16 元钱一斤，悬殊太大了。80 年代中期，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新西兰带回一盒子两个猕猴桃，交给我们研究，说这是从中国引进新西兰的，现在他们发展起来赚大钱，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恢复我们传统产品的市场。他当时告诉说这一个塑料盒子两个猕猴桃，多少价格呢？一元美金，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八元多人民币，一个就四元多人民币。中国的东西确实很便宜，外国人到中国市场一看都惊讶，便宜得惊讶。但话说回来，这样便宜，

对农民来说不见得好。中国有句古话：谷贱伤农。果贱也要伤农。1998年陕西出的苹果，两毛钱一斤没人要，后来农民就索性不要了，谁去果园采收都可以，这还不是个别的现象，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里也有产品质量问题，优质产品的销路和价格是比较好的。由于这样一些现象，可以说短缺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供求大体平衡，丰年有余，是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但是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带有结构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从总体来讲，中国农产品的消费水平还是不高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学上有一个恩格尔系数，就是居民食品的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城市是百分之五十以下，农村还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村消费的农产品，即直接消费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口粮也在下降，但是下降的数量与城市相比要低得多。1998年，城市直接消费的口粮，降到人均88公斤，平均一天不到半斤粮食。在城市里，吃饭的习惯，还离不开粮食，再低也低不到哪里去了。要细分一下的话，早餐一两，午餐二两，晚餐二两，这是最低消费，是不是还能降一点呢？可能降一点，但降不了多少，我看已经到底了。中国人有个习惯，山珍海味吃完以后，还要吃点大米饭，吃点面条，吃点馒头。还是要吃点主食，不吃点粮食不舒服。过去高达150公斤，从150公斤下降到88公斤，下降幅度是很大的。农村人口直接消费的口粮也在下降，1998年是249公斤，最高的时候达到260公斤，从260公斤下降到249公斤，幅度不算大，但它的绝对量比城市还要高好多。粗细粮的比例有很大变化，细粮的比重由45%上升为84%。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村消费水平，吃的口粮也降到了城市的水平，不要说88公斤，就算100公斤，那么他们所需求的由粮食转化成的动物食品那个数量，有多么大！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开拓中国市场潜力在农村，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城市里吃的肉、蛋、奶的水平，比农村肉蛋奶的消费水平都高一倍到两倍以上。话又说回来，农村这么低，是不是农民不愿意吃？农民也懂得，肉、奶、蛋好吃，营养也好。但是，限于他的购买力，限于他的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他们现在达不到这个要求。农村结存一点钱，首先要解决盖房子的问题，还要解决子女教育的问题，也还要解决养老和医疗的问题，这属于社会保障范畴里的事。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农村方面的量太大了，都靠农民自己解决。在城市里，下岗职工，国家很重视，实行分流，再就业工程，最低生活费保障。而农村呢？这些国家没有管，都是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农村也有下岗问题，乡镇企业不景气，关停并转的，还要下岗，下岗到哪里呢？下岗到家里，依靠承包的几亩地养活自己，土地成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判断，农产品供求平衡，而且是结构性的、阶段性的“供大于求”。

第三，由于新阶段的标志是现在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就是原料，经过粗加工和精加工以后，变成工业化产品数量还很少。从全国来讲，我国农产品的加工率，综合来算30%左右，发达国家为80%以上；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率我国为8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1以上，有的达到300%到400%。即按产值来算，一万元钱的农业产值，加工后可达到三万元到四万元。而我国生产的农产品，上超市货架的产品很少，这也是我们农业相对落后的表现。现在要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以生产原料为主的初级产品，进入到经过粗加工精加工生产最终产品的阶段。

第四，新阶段的标志就是我国农业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经营、传统型经营，进入到集约型的经营、现代型的经营。实现这个转变，主要是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科技贡献率。我们现在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综合来算是42%，要求2000年达到50%，还要增加八

个百分点，这也不容易。到下一世纪，21 世纪要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有些领域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科技贡献率是 80%以上，我们是 42%，距离很大。所以要通过实行科教兴农，从粗放型的经营转到集约型的经营，从传统型的经营转到现代型的经营，这也是一个大的转折。

第五，农业的持续发展要从消耗资源和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经营转入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我们过去农业资源是不定价的，土地是最珍贵的资源，浪费也很大；水也是最珍贵的资源，浪费也很大。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无价。在农产品成本里，土地不计价，不算成本，现在要算了。长时间以来，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使农业处于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状态。现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科学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掘资源的潜力，把资源和环境保护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80 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生态农业，既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又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把它统一起来，很有成效，不再走过去的传统老路。传统老路是什么呢？以过度地消耗资源为代价，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得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老路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过去我们农业主要面对国内市场，而且主要是面对城市市场，因为农村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现在粮食总产量 5 亿吨左右，其中三分之二是留在农村的，商品粮只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属自用粮，叫“三留粮”。农产品的综合的商品率为 70%，30%是自给性。今后进入新阶段，有个市场的转变，就是从国内市场转变为走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又面临新的形势，即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问题。

综合上面六个重大的变化，重大的转折，表明了中国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中国农业的现状。

下面讲 21 世纪中国的农业和农村，也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问题，这也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不能孤立地来研究，就农业研究农业，就农村研究农村，就农民研究农民。要从国家的整体并联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来考虑。总结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的历史经验，要实现刚才说的六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要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目标，讲起来内容很多，形象一点说，简要一点说，就是一二三四五。下面还有一句话，上山打老虎。我现在就讲这个问题，一二三四五是怎么回事呢？

一、一个基本的理论

这个基本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邓小平同志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给我们中国定位，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位置上。这是具有非常深刻意义的。我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大家学过《哥达纲领批判》这本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绕口一点。初级阶段的理论已写入党的十五大决议和修改的宪法中，特别

指出，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了“长期”两个字。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

毛主席功劳很大，晚年犯了一些错误，我看最大的错误是老人家太急了。想依靠强大的政权，来加速我们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特别是在 1958 年，在农村亲自领导指挥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名称也是毛主席确定的。当时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五花八门，毛主席听了之后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当时流传一句十分振奋人心的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就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要找个梯子，这个梯子中国找到了，这个梯子是人民公社。所以毛主席很兴奋，本来提了个口号，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七年赶超英国，十五年赶超美国，叫做赶英超美。本来话里头还有“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他还嫌不够，就把更长一点时间改成为“十五年或更短一点时间”，超英赶美。并把赶超英国的时间缩减为二三年。他太急了，从而不断地反右倾保守。在这个时期毛主席花很多时间研究人民公社。我看研究农村问题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他的。有一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巨著，他对每一篇文章亲自逐字逐句阅读，亲自修改，最后加了按语出版的。深刻反映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思想。而且他逻辑性非常强地勾画了如何过渡的过程。讲了经过三个过渡，最后达到消灭三个差别的目的。三个过渡，怎么过渡呢？第一个过渡，在人民公社内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为基础，还有大队，还有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然后，由小队为基础过渡到大队，由大队过渡到公社。第二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有第三个过渡，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通过这三个过渡来实现共产主义。

北京市 1958 年建了十个大的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那是做样板的，当时还宣布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最终目标，就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变成按需分配，由各尽所能变成各取所需。消灭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勾画得非常美好。

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听到这些的确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很快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啦，而且说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未来，很快就在眼前。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当时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全部下放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也下去了。

我去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的地方，遂平县的嵕山公社，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那里蹲点，研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大形势是一天等于 20 年。我一看有点凉，住的是土房，没有床，铺垫麦秸，吃的是豆腐渣的窝头，一人一顿给一个，没有菜，有一个汤，汤是开水煮红薯叶子，加点盐巴。我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就是这个水平？豆腐渣很难咽下去，还要劳动。我有点怀疑，但对迈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很坚定。

这个公社是最先放“卫星”的地方，把科学家都弄糊涂了，这边一个“卫星”，那边又一个“卫星”，放得越来越大。第一个卫星就是陈伯达蹲点的地方，有一个支部书记是个“劳动模范”，创造了小麦亩产量 3200 斤的记录。后来小麦卫星放到亩产 8000 斤，一亩地 8000 斤，也就是一亩地四吨。农大有很多专家、教授有点怀疑。农学系的系主任蔡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他培育出很多高产的品种，如农大 183 号等，推广面积很大。他不相信能亩产 3200 斤，科学家怀疑劳动模范的产量，这是个问题呀。不相信就是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因而不相信也不敢说。一位学植物病理的讲师是系里

的总支书记，他到晚上去收麦子的地里看，没翻地，麦茬还在，正好有月亮，他又拿手电去数麦子的分蘖，数有几个有效植株，然后一个分蘖有多少个小穗，每一小穗有多少麦粒，一算就算出总的有多少粒，然后算了千粒重是多少，最后产量就出来了。算出来以后，与3200斤差距太大，只有四百斤。说实在的，1958年在河南这个地方，小麦四百斤产量就算不错了。

陈伯达这个“理论家”就要求蔡旭教授同这个劳模竞赛，你教授的产量不能低于劳模，就这个原则。康生就曾经给农业院校的教授提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用产量计算的，教授是多少，副教授多少，讲师多少，助教多少。康生说，亩产1000斤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当四级，3000斤当三级，4000斤当二级，5000斤当一级。陈伯达要求蔡旭教授同劳模竞赛，你的产量不能低于他，你低于他怎么能当教授呢？教授产量比不上一个农民的产量，怎么能教书呢？给他施加压力。这个老教授非常苦恼，几天几夜没睡觉，最后表示说，我认输吧，我争不过他，我无法跟他争。但不争不行，你是教授必须跟他争，要不然你教授当不成了。没办法，领导做工作，后来想来想去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比赛吧，当然产量要比他高，高多少呢？高一两，即3200斤零一两，就这样才算过了关。

这个事例是很深刻的，我讲这个例子大家觉得很好笑，但这是历史，是真实的，我们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这种事，特别愚蠢的事。毛主席想把中国建设好，尽快地富强起来，心是多么好啊，而且他对农民有浓厚的感情，他在农民身上花的精力是最大的，操劳了一辈子。我刚才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但是，光有好心不行，太急也不行。当时自己又很自信，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发展到了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等等。一些地方出现缺粮和发生浮肿病，维持不下去了。但有几个省委书记还不信，认为共产主义是方向，不能动摇，公共食堂不能解散。毛主席总觉得有点问题，派自己的警卫员回家乡去看，回来以后向他汇报，村子里公共食堂怎么样？警卫员讲实话，不行呀，吃不饱呀，挨饿呀。毛主席这才下决心说赶快解散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别要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不要了。当时把吃饭不要钱说成是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按需分配的萌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

我讲这些历史，有深刻的意义，不能急，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水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任何时候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判断中国国情最科学的标志，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来判断中国的国情，就会使我们头脑清醒。这个基本理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基本的依据，离开这个基本理论就会犯错误，就会欲速不达，最后还得倒转回来。

二、两大市场主体

这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在五万个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形成了两个大的市场主体。

第一个市场主体就是农户经济，即家庭承包经营，或家庭经营。这个主体有多少呢？全国共二亿二千万户，这是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现在中央的政策很清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新的提法，我们感到欣慰。

第一，过去的提法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共十三个字，现在改成六个字：家庭承包经营，把“为主”去掉了，把“联产”去掉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包干”，

也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发明。这个说法非常科学，“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这三句话不是大学教授说出来的，是小岗村的农民说出来的。中国的农民，知识文化程度低而思维文化是很高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第一位，交足国家的，皇粮国税我不欠；留够集体的，也就是“三提”（村的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和“五统”（乡的五项统筹费：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民办教师、修道路、优抚）是交集体的，农民承认这部分负担也留够，其余的都是自己的，你就别再伸手了。马克思讲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作了必要的扣除之后其剩余应该留给劳动者，不能再伸手跟劳动者要了。这对过去人民公社制度是个革命性的措施。当然实行这项制度变革和创新，当时冒了很大风险，有十八户农民秘密开会，按了十八个手印，对外讲，还是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对内讲，就是大包干，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其余都是自己的。而且还有诸如一旦遭到非议准备坐牢，如果十八户农民坐牢，这十八户农民的子女，由全村的村民抚养。这张契约现在变成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的文物，珍藏起来，是无价之宝。就这么个创举，引发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小岗村时，说了两句话：你们当时冒了风险的；第二句话：这项制度 30 年以后也不能变。

这是第一，提法简化了，家庭承包经营，六个字，如果再简化就是家庭经营四个字。

第二，是把这个政策作为农村政策的基石，基石是不可动摇的。它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第三，是要给农民三个权，这特别重要，一是土地承包权，二是生产自主权，三是收益分配权。有了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使农民在经济上能当家作主。特别是收益分配，在扣除成本，依法缴纳税费以外，都是我自己的，任何人不能再向农民索取，否则就是侵权。因此要依法保护这三个权。

第四，是这种经营形式不仅适合传统农业，也适合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不能离开家庭承包经营制，数量可以减少，规模可以扩大，但不能改变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制度。这是由农业的特点决定的，它与工业不一样。农业是生物性产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不一致，最适合于家庭经营，世界各国都如此。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一个农场，一家三个劳动力，经营 6000 亩土地，一个劳动力平均 2000 亩土地，三个劳动力是三代人，都是农学院毕业的，回家当农民，而且是自耕农，一个工都不雇，包括短工都不雇，全部是大型农业机械。这里有个问题，说农业是弱质产业，看你怎么来经营它，像这样的农业就不是弱质，而是强质，它的劳动生产率很高，超过当地的工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建立新的农业产业大军，农业工业化，就是用工业的装备来经营农业，达到很高的水平，最终消灭工农差别，而经营形式还是以家庭为单元。“家庭承包经营”这一个市场主体，全国共有两亿二千万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市场主体。

第二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异军突起”，农村的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个主体全国共有二千二百万个。简单的可以记两个“2.2”，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农户经济是二亿二千万户；一个是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是二千二百万个，两个“2.2”。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也可以说是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主体。因为十二亿五千万人口，九亿是农村人口；而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决定我们未来中

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力量。不仅是对农业，对农村，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这是第二。

三、农民的三大创造

2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农村有三大创造，也就是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

第一个大创造是农户经济，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应该说非常了不起。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相当难的，从上面说到的产生过程看出是相当难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形成三面红旗，是不能动摇的。谁在这个问题上动摇，谁就要犯错误，就是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59年彭德怀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吃了个大亏，就是上书毛主席讲了大跃进中间、人民公社中间的一些问题，最后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已成为一个历史教训，以后不能再重演，我想以后也不会重演。

上面已经说到，小岗村当初冒着风险，实现这种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变革，不仅他们有压力，他们的上级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安徽凤阳县，是朱元璋的家乡，明代第一个皇帝，当了明太祖，这个地方十年九荒，唱花鼓戏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朱元璋这个皇帝是讨饭起家的，家里很穷。凤阳县当时的领导有压力，他们支持小岗村，但是有压力。凤阳县上面的领导是滁县地区，滁县地区的领导有压力，他们支持凤阳县，但是有压力。安徽省的领导也有压力，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是积极支持的，但是他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北京的最高的中央领导人是不赞成的，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人是不赞成的，不但反对大包干，连包产到户也反对。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变成一个禁区。

早在60年代的时候，在大跃进中饿死了人，这是很惨痛的。安徽省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经看到一个村子的农民包产到户以后解决了好多问题，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发展了，不但不要国家的救济粮，还给国家交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他很高兴，就准备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的经验。那时不叫包产到户，开始叫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把产量包到户里，他就试验推广。这么大一个制度变革要请示中央，请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他讲了两句话，他只记住前面一句，后面一句他没记住，吃亏吃在后面一句没记住。前面一句话：既然是好，群众也拥护，那你就试嘛。他壮了胆子，毛主席同意试验，他就大面积推广。但他对后面一句话没注意，没当回事。后一句话是“搞错了你就检讨嘛”。这句话就厉害了，后来就认为他搞错了，没完没了的检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又翻老账，包产到户，属于“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给你戴上了。所以包产到户变成了禁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毛主席批判过包产到户，批评过曾希圣，你就不能再搞包产到户。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对这个问题比较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有25条，是个革命性的文件，推动了整个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但是其中也有缺陷，也有局限性。在讲到人民公社体制时，还要巩固和完善三级所有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动摇。而且还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也就是不许私有化，是应该的；但不许包产到户就是一种限制。当时分管农村改革研究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觉得第二个不许太硬了，建议把这个“不许”改成“不要”，

即改成“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不要”比“不许”在语气上缓和了些但还是限制的。不允许你做也就是不让你做，还不是限制？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压力很大。当时中央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不能够变动，包产到户在 60 年代就被批判过了，你现在又重新捡起这个“破烂”，贩卖资本主义，还得了啊。我说这个历史的意思是改革很难，来之不易，就这个意思。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东风十分强劲，下面发展得很快，不约而同的，不仅搞起了包产到户，而且搞起了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更彻底。到 1983 年底，全国 99.8% 以上村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个奇迹，很多外国朋友同我们接触老提这个问题。他们说怎么也想象不到，你们中央没有开会，没有发文件，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还限制包产到户，怎么一下子全国行动起来了，怎么一夜之间把土地分到户了？我说我们也没有想到，后来经过调查研究都明白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然要改变，这是历史规律，任何力量是阻挠不了的。

我刚才讲的，农民的思维文化很高，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九亿农民人家自己解决了。而且没通电话、没开会、没商量，自然形成一种一致行动。比如说一个村子，一百亩地，20 户人家，一户平均分五亩地，这五亩地怎么到户？把这一百亩地，包括好地，劣地，分为 20 等分，编成 20 个号码，然后 20 户的户主抓阄，抽一个拿一个号，把地分到每一户，一个晚上就解决了，谁也没有意见。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也有思想不大通的人说：“辛辛苦苦 30 年，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当时有这么一个笑话，很有意思。有人批评说，把地分了，七零八碎。但是如果好地都给干部，劣地给农民；近地给干部，远地给农民，那怎么能分下去？那不打破头吗？所以七零八碎有历史的必然，很快通过协商做了调整。四川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农民分了十三块地，四川是人多地少的地方，一个人只有几分地，不到一亩地，一户只有几亩，分成十三块，十二块都是看得见的，有一块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发现在他戴的草帽底下盖着一块。这当然有点夸张，草帽底下一块地怎么种？后来我们同外国人一介绍，他们也都明白了，说中国农民真了不起，富有创造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是个美国人，他考察中国大包干以后，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很精辟，他说：“大包干是中国农村社会一切进步的第一推动力”。这个评价不过分，大包干是中国农村社会一切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来之不易，其意义非常伟大。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依法保护和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改变这个制度，重新再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后来中央的几个一号文件也不断地修改说法。开始是“不许”和“不要”，然后到 1979 年，中央发了个 75 号文件。说一般的地方还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巩固完善，少数贫困的地方、偏远的地方，群众要求搞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也可以”的说法，这就是一个大的突破，为农村的改革开了绿灯，露出了曙光，突破了包产到户禁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也是从最穷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最薄弱的地方闹革命，是最容易成功的。农村发展也是如此，从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的地方先突破。这就是从“不许”和“不要”到“可以”和“也可以”的过程。突破了一个禁锢，人们的思想也就更加解放了，然后大面积铺开。到 1983 年，全国 99.8% 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有的一步到位，不经过包产到户，直接实行大包干。包产到户还保留工分，工分还要经过干部，包干到户取消了工分，不经过中间环节，不通过干部给他计算工分值，来计算他的收入，是比较彻底的。

从 1982 年开始，每年一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不断修改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从“不许”和“不要”到“可以”和“也可以”，然后是“这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的”，给它定了性，是姓“社”了，不是资本主义了，解除了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忧虑。然后是“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给以高度评价。然后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上纲了，有了理论依据，腰杆子更硬了。然后是“这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地修改说法，表明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转变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坚持这个制度，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不断地被侵蚀，刚才讲的保护三个权益很重要。第一个土地承包权，大家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动不动就是政府的红头文件，下命令把农民的土地收上来，搞开发区，搞房地产，多得很，农民因土地流失而兴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央政策很明确，执行当中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认为，大包干的生命力已经完成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不能适应大市场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总想改变这项制度。中央的政策还有一条，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推进适度的规模经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应该看到，中国的土地的经营规模在全世界最小，两亿二千万户，只有 14.3 亿亩耕地，每户平均只有 0.42 公顷，合每户 6.7 亩，一个劳动力负担三亩地。有人对我们中国的农户经济下了个定语，叫“超小型的农户经济”。特别是在加入 WTO 以后，如何同外国竞争？美国的农场平均二千亩，加拿大是三千亩，澳大利亚是四千亩，这就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这个条件，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然后在农民自愿要求下，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移给别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做不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规模，他们是五十公顷到六十公顷，五十公顷是 750 亩、六十公顷是 900 亩，低于这个规模，他就没效益要赔钱，经营不下去。同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相比，也比他们小。日本每户为 1.2 公顷，合 18 亩；韩国也是 1.2 公顷，合 18 亩；台湾是 1.02 公顷，合 16 亩，也比我们 6.7 亩大。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家庭经营为单元，通过为一家一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高度发达的社会化服务，提高规模效益，使农民以最少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取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好的典型。

第二个伟大创造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异军突起”是邓小平说的，是他的“专利”。乡镇企业形成一个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格局。中国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变成两个工业化，一个城市工业化，一个农村工业化。原来只有城市工业化，现在城市工业化之外，又出现一个农村工业化，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体上是这样：分两头来说。第一从农村内部来讲，乡镇企业 1998 年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75%，四分天下有其三，农业是 25%，这是了不起的创造。从劳动力结构来看，现在在乡镇企业劳动的职工，是一亿三千五百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四亿五千万的 30%，也就是 30%的劳动力创造了 75%的产值，农业的劳动力还是太多，但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概念，从农村内部来讲，结构上的重大变化。第二，从国民经济全局来讲，大家可能不大清楚，我在这里可以说一说。现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总量当中，农村占大头，城市占小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从 1993 年开始，农村占全国 GDP 总量的比重大于城市。1998 年为 55%与 45%之比。农村是 55%，城市是 45%。所以研究中国经济，大头在农村，当然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上有所不同，研究城市国有企业

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经济的大头在农村。农村是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城市只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从 GDP 的增长率来看，大头更是在农村。1998 年全国 GDP 的增长率为 7.8%，原来的目标是确保 8%，后因两大冲击，一个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特大的洪涝灾害，仍获得了 7.8% 的增长率。朱镕基总理在三月份的人代会上作报告的时候，讲到 7.8% 说了一句话“来之不易”，大家热烈鼓掌。但是分析一下 7.8% 的结构，在 7.8% 里面城市是 2.33%，农村是 5.47%。按百分比来算，城市占 29.9%，农村占 70.1%，大致是七三开，农村是七，城市是三。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把农村这部分去掉，只看城市，只有 2.33% 的增长率，不是高速，而是低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农民。主要靠农民，不能说得绝对，说得片面，否定城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贡献，这也不客观。但应充分估价农村这部分地位与作用。1998 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为 3.5%，而我国城市只有 2.33%，低于美国，还能叫高速吗？我们 7.8%，高于美国，比它高一倍多，就是因为我们有农村这一大部分，就这么个道理。这种情况从哪年开始的呢？从 1991 年就开始出现这种局面，已经连续 8 年了。去年两大冲击，冲击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农民，在这个情况下，他做了 5.47% 的贡献，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冲击非常之大，使出口创汇大幅度下降，增长率由上年的 16.85% 下降为 2.5%，跌了 14.3 个百分点；而特大洪涝灾害首当其冲的是农业，这不言而喻。再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1996 年，全国 GDP 增长率为 9.7%，城乡比例是个什么关系呢？是 86% 与 14% 之比，即在 9.7% 中农村是 8.23%，占的比例为 86%，城市是 1.47%，占比例只有 14%。

讲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软着陆是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是两位数左右的增长率，即百分之十左右，去年的 7.8% 也算高速增长，接近 10%，这主要靠农村。还有一层意思是低通货膨胀。经济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往往是矛盾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就会拉动通货膨胀，如果抑制通货膨胀，往往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使这两者统一起来，既是高速增长，又能低通货膨胀，这是很高的经济艺术。这个很高的经济艺术是怎么得来的呢？还是靠农民，高速增长上面已说过了，而低通货膨胀大家也很清楚，不言而喻，是由于农业丰收，农产品的供给大于需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连续两年疲软使整个物价下跌。全国已连续十八个月的物价是负数，是谁拉动的呢，是农产品拉动的，是农业生产者农民。

换句话说，在软着陆问题上，包括低通货膨胀这件事上，农民作了贡献，再说得尖锐一点，是农民作了牺牲的，是以降低他的收入增长幅度为代价的。1997 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由上年的 9% 下降为 4.6%，而 1998 年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又下降为 4.3%。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对农民收入上不去的问题，大家都很着急，开会、发文件。怎么上得去呀。两毛钱的桔子还没有人买，送给别人，收入能上去吗？国家花了很大的气力采取保护价的办法，保护粮食，财政上拿了很多钱，修粮库。朱镕基总理非常关注这个事，不惜一切，国家要保护农民，保护价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敞开收购，不能拒收；粮食企业实行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保证不打白条，做到现金兑现。但好多地方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尽管采取这样的政策措施，而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限的。现在因为粮食多，国家包袱很重，先把几个劣质品种退出保护价，一个是北方的春小麦，一个是南方的冬小麦，还有南方的早籼稻，品质差，打招呼了，从 2000 年起退出保护价，通过运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

我还要讲一个财政和金融的问题。在财政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即取和予的关系，仍是取大于予。1998年，全国农民缴纳的税金，包括农业税，包括乡镇企业缴纳的税，是一千九百九十八亿元，国家通过财政各种渠道返还农村的，用于农业上的开支加在一起是一千二百五十亿元，农民净积累七百四十八亿元，现在还是取大于予这种局面。农村信贷方面，1998年有一万六千九百亿元的储蓄，全国城乡居民的储蓄是五万多亿元，农民贷出来的是一万三千亿元，还有三千亿元是流入城市的，其中当年通过金融这个渠道净流出的是五百亿元。以上两项农民净流出一千二百四十八亿元。

农村的“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按国家规定不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各地报上来的没一个超过5%的，也不可能超过5%，这牵涉到地方干部政绩。农民这部分负担实际上是农民对国家作的贡献。因为这个负担，城市居民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城市居民，有这些负担吗？一点也不负担的。拿五项乡统筹费来说，民兵训练还要我们城市居民负担吗？学校教师的工资还要我们城市居民负担吗？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开支，还要我们负担吗？优抚、困难户、五保户还要我们负担吗？修道路还要我们城市居民负担吗？这都是由国家开支，农村是农民，这个开支数量也相当大。1998年人均100元，全国约有九百亿元。还有两工，即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一年共30个工，这个负担折合成货币，比刚才讲的“三提”、“五统”多一倍以上。它是无偿的。一个工算它八元钱，三八二百四十元，全国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因此，研究农村市场的开拓，就要研究农民的收入，我们城市居民的收入全部是货币而农民的收入不单是货币，还有实物。农民的人均收入，1998年是2160元，他们的收入结构，大体上百分之七十是货币，百分之三十是实物，包括口粮等，这是按价格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货币收入，烧的柴禾也是算钱的，房前房后种一点菜，养几只母鸡，下几个蛋没有卖，留下自己吃的，也都算在2160元的收入里。农村购买力从何而来是个问题。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研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没抓住要害。还要说一个事实，现在在乡镇企业里劳动的农民是一亿三千五百万，加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过去叫人家盲流，欺侮性的，以后改为“民工潮”。“潮”也是可怕的，潮流来的时候还了得？现在叫“农民工”，有的用外国的词，叫“打工族”，有多少？大约七千万左右，两项加在一起约两亿，当然中间还有个交叉，说大数吧，两亿人的农转非问题，古今中外是没有的，找不到第二个。20多年时间，解决两亿人就业问题，是破天荒的奇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叫铁夫人，连任几届首相，英国增加了两百万失业人口，她下台。我们两亿农民就业，农民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尽管他们现在还是农村户口，还是农民，但是他们从事的职业已经是工人。你想想在农村乡镇企业中的纺织厂干活的纺织工，和城里纺织厂纺织工人有什么不同？不是完全一样的吗？但他们是农民，城市是职工，是国家职工；他们在农村还是农民，还带“农”字的。企业家叫农民企业家，像鲁冠球等等，是鼎鼎大名的世界性的企业家，还叫农民企业家，离不开“农民”这个词。两亿人的就业，是要支付成本的。就业的成本，按城市国家企业职工来计算，最低一个人不少于两万元，两亿是多少？共四万亿元。简直是天文数字，相当于1998年全国GDP的一半。这四万亿元的成本，是农民自己付出的，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评价都不过份。

还有另一个两亿人，就是减少两亿贫困人口。这两个两亿都是大数字。1978年的时候，全国贫困人口有两亿五千万人，到1998年为止，剩下四千二百万人，今明两年还要解决两千万人的温饱问题，剩下还有两千二百万人，是最困难的，是硬骨头，留到下个世纪解